

新媒体语境中江苏省新型农民培养研究

张寒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 鉴于新媒体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并已成为改变农村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在界定新媒体和新型农民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的结果,分析新媒体对农传播的现状,并探讨新媒体在培育新型农民过程中的改进空间,以期通过政府、新乡贤、新媒体和农民自身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发挥新媒体的催酶作用,实现江苏省新型农民培养的有效性,并对其他地区形成示范。

关键词 新媒体;对农传播;新型农民;培养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7)15-0226-04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Farmers in Jiangsu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ZHANG Ha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 Since new media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ural area, the new media and new farmers were defined at first,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media service for the farmers were analyzed and proposals of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new media were put forward, it could not do without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government, the able person, the new media and farmers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ree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I hope to provide worthy using for other areas and make farmers can be a driving power to speed up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rbaniz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Spread to agriculture; New farmers; Cultivation

现代化是指使人类社会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是以工业化实现为核心的全面社会变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从现实出发,纵观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石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从传统意义上“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过渡。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地位不断被提高,但在推行落实的过程中,一些以增进农民福祉为目的的城镇化发展项目却总是把农民这个主体排除在外,本末倒置,这一现象应引起重视与思考。

“人口强势,地位弱势”反映了农民群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部分地区的农民素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成正比,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素质尤其堪忧,这必然阻碍了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的良性发展。鉴于新媒体在农村迅速发展并已成为改变农村文化生态的一支重要力量,且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交互性与及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特性,笔者发挥“在地性”意识,从农民与外界交流的众多渠道中选取新媒体为主要方式,结合江苏省特色,着重研究新媒体对农传播现状和农民新媒体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然后从政府、新媒体和新乡贤等角度提出对策改进,通过外在的便利条件激发农民内在动力,使农民主动向新型农民目标靠近,最后达到新媒体与农民双线提升的理想状态,推进江苏新型农民的培养,并为其他地区在培育新型农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供解决思路。

1 新媒体与新型农民解读

1.1 新媒体的“新” 媒体的发展经历了精英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3个阶段,这3个阶段也分别代表着传媒发展的3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所谓“新媒体”,指的就是当下信息时代万物皆媒的环境,以个人为中心

的新媒体从边缘走向主流。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术界尚无定论,内涵与外延混乱不清,边界与范畴模糊不明,因此,该研究将其置于一个相对的概念中进行解读,以明晰研究的视域。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既有媒体传媒信息、服务受众的一般属性,也日益呈现出高度交互性、社交性、服务性甚至交易窗口等独特属性,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1]。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包括数字报纸、数字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网络自媒体、桌面视窗、触摸媒体等的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首先,在传播学理论中,德弗勒提出的互动过程模式克服了香农-韦弗模式单向支线的缺点,明确补充了传播过程中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进一步模拟了传播过程中互动的特点,这个理论也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新媒体时代相较以往“互动性”更强,传统媒体的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没有实时的表达渠道,新媒体则使得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变得模糊,受众可以与传播者交互信息甚至实现身份替代。其次,新媒体强调影音文字信息的整合,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上,信息往往以声音、文字、图形和影像等复合形式海量呈现。最后,新媒体迎合了社会高速发展的信息需求,以及受众对于多样化、个性化信息流的消费转型,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兴趣、爱好,私人订制信息。

1.2 新型农民的“新” 该研究中的“新型农民”,并不狭隘地等同于“新型职业农民”,而是与传统农民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十一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由此可见,出于发展的需要,农民的经济标准在提升,这种趋势贴近 E. R. 沃尔夫在分析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

基金项目 国家级 SRT 项目(201610307078)。

作者简介 张寒(1995—),女,江苏宿迁人,本科生,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收稿日期 2017-03-22

(farmers)的区别时提及的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农业者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生产。然而,1962年吉尔曾提出界定农民概念的3个标准——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不能陷入只注重提升农民经济地位的泥沼,对于农民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推动应当并驾齐驱。

新型农民较传统农民而言,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文明素质和民主法制素质,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勇于追求幸福生活且拥有更高的利益诉求;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继承传统农民勤劳、朴实、善良等优良品行的同时拥有开阔的视野和正确的价值观;知法、懂法、明法、守法并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喜忧参半:新媒体对农传播的现状

江苏省经济位居全国前列,但是省内经济差距比较明显,南部的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北部。其中苏南地区经济水平长期位居前列;江淮地区南部扬州等市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苏北北部则仅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为了保证样本的精确性和代表性,样本涵盖了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

该研究采取典型调查、分类随机抽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的调查方法。具体做法:①选取江苏省作为典型调查省份。②按照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把江苏省所辖的地(市)划分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3类,即苏南、苏中、苏北。然后,在这3类地区中随机选取了3个市作为调查对象。③在选取的3个市中随机选取6个村作为调查样本,其中,走访了无锡市大家桥、无锡市杨园里、扬州市六巷村、扬州市公路集、宿迁市汴河村和宿迁市宏伟村6个村。④在调研地区以普通农户、村中知识分子和村中能人为分类进行个案访谈。

此次调查发放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96份,问卷有效率达98.7%。个案访谈累计36人,其中普通农户24人,村中知识分子9人,村中能人3人。受访农民男女比例为51:49。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农户的基本信息、对新型农民的认识和新媒体的使用情况、对本村各方面建设和村中人际变化的感受等,最后一题为开放性问题,询问当地村民在目前的农村生活中影响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什么。访谈内容则是对问卷内容的细化,其中包括新型农民、新媒体、新乡贤、村中建设等,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不设固定题目,具体问题及问法结合当地实际,考虑受访者自身情况,目的在于更加详细地了解受访者的相关想法感受,使调查结果更加真实可靠,便于进行分析。

2.1 农民对新媒体的使用

2.1.1 消费量巨大但消费层次偏低。近年来,国家战略持续助推新媒体发展,新的媒体生态圈和媒体生态系统逐步成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在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26.9%,规模为1.91亿;城镇网民占73.1%,规模为5.19亿。调研结果显示,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中,互联网的使用者最多,电视和报刊杂志次之,广播最少,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竞争中,传统媒体承受的市场压力越来越大,农民对新媒体的态度是开放的,新媒体的市场外围在不断拓宽。

问卷数据显示,江苏省农村居民对新媒体的价值认知是较为准确的,但消费形式单一。在有关新媒体对日常生活的作用调查中,回收的296份有效问卷显示,新媒体的休闲娱乐功能最受肯定,同时会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快捷地接受信息、了解时事的有122人,学习新知识或技能的有131人,仅88位受访者认为可以通过网络做生意。由此观之,新媒体在日常生活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已深入农民家庭,但是农村居民对新媒体的使用水平较低、使用程度不足,没有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来实现自我的提升;300名受访者中,会使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农村居民占比41%。

在半结构式访谈中,关于新闻资讯方面,住房、教育、就业和二胎政策等问题被多次提及,而对国家大事政策关注相对较少,农民参政议政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渠道看,农民了解时事政治以电视为主,辅之以网络、报刊杂志、与人交流和广播等途径,农民利用新媒体来促进自身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2.1.2 使用面广但信任度不高。通过个案访谈,深入了解农村居民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当问及“您认为新媒体可以为您提供什么”时,受访者对新媒体的了解和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接收信息。对于新闻时事的了解,不再局限于电视广播的定时定点放送,移动终端实现了信息接收的随时随地,且村民可以针对自身的喜好与需求,做出更多的信息选择。二是娱乐生活。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其功能的多样性丰富了大众生活,增强了农村居民生活的娱乐性。

关于网络销售,296份有效问卷中,有142人表示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是不可行的,81人表示不清楚,仅有73人表示可行。浅析个中缘由,一是因为农民群体本身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低于城镇居民;二是在农民心中,新媒体并非安全可靠,涉及到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是如此。这一现象需引起重视。

大众传媒的发展、自媒体的兴起,体现着人民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媒体不再只是官方的“喉舌”,新媒体传播面积大、传播速度快等优势,使之成为人们捍卫和获取自身正当利益的工具,呼告、帖子、微博等词汇不断丰富着“抗争性话语形式库”,媒体与社会抗争的联系愈加紧密,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抗争者往往通过与媒体的互动来表达抗争诉求,以期获得曝光和社会关注,并进而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成为社会抗争者自我表达甚至组织动员的重要平台^[2]。然而在农民利用互联网来进行利益维护的满意度调查中,有190人的态度是“一般”,占比64%,满意度

最高的渠道是“村或镇干部”,由此管窥,新媒体虽已在社会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城乡居民在抗争中的媒体利用能力的落差,暴露了潜藏的数字鸿沟。

2.2 新媒体的农村渗透

2.2.1 发展较快但使用率较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农村信息化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受众也给新媒体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学者邹华华等^[3]指出,由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新媒体自身的成熟,新媒体想要很快实现对农深入有效的传播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由于新媒体对包括农村在内整个社会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新媒体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在作用,以及农村现有的基础条件,新媒体走入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必然趋势。新媒体以较快的速度迎合着农村居民的信息需要,但农民接受并习得的信息比重相对偏低。

以“三农”问题为例,23位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三农”政策,150人表示关注,100人表示一般,仅23人表示不关注。随着新媒体发展,信息流速加快,农民对“三农”政策信息的渴求可以更大程度得被满足,传统主流媒体对“三农”宣传报道的问题可以形象地表述为“俯不下身子、换不了脑子、找不准位子、拉不开嗓子”。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怀疑“三农”报道的社会价值,更具倦怠“三农”的宣传报道业务,农民也不认同对农传播媒体的服务效益,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更少关注主流媒体的报道,导致大多数媒体的农村市场日渐萎缩,因此加剧了传统主流媒体“三农”宣传的危机^[4]。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一方面找到明确的路径来发挥引导、宣传和推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尚未取得农村居民的信任,导致信息的使用率较低。

2.2.2 促进新农村建设但退化人际。经过几年的发展,除了国家各级惠农政策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之外,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即新媒体在农村地区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同时,农村地区的繁荣在反哺机制的作用下又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5]。访谈中,普通村民认识到新媒体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让大众更接近真相,把农村地区被掩盖的各类问题带到公共视野,推动农村的发展;村干部、村中能人和知识分子较好地认识到了新媒体给农村经济带来的商机和能改变农村生态的巨大潜力。人际方面,关于“农村人际关系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的调查中,121位农村居民认为“更加疏远冷漠”,78位认为“更多冲突和对立”。不可否认,新媒体可以提供农业信息服务、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促进新农村文化教育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增进了农民与外界的联系,使农民更加关注自身,但一定程度上在人与人的交流方面,带来了不同的影响,部分影响不尽如人意。

3 路径选择:以新媒体培育新型农民

3.1 新媒体应不断优化以配合发展

3.1.1 与传统媒体取长补短加强配合。2016年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 7

(2016)》发布,书中认为,“2015年,国家战略持续助推新媒体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通过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深度影响中国社会各层面发展,新媒体影响力不断深入与扩大”。新媒体的发展势头良好,传统媒体在寻求出路,新媒体有诸多优势,传统媒体则有多年积累的公信力,二者若是能够取长补短、加强配合,方能更快地深入农村地区,提升农村居民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使得新媒体承载的信息被更好地接受并得到有效转化。

3.1.2 提升信息的针对性并强化反馈机制。针对新媒体信息转化率及使用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新媒体自身的原因。利用新媒体培育新型农民,首先要知道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但目前新媒体制作者本身存在局限性,相关的涉农项目建设不完善;新媒体的储存信息容易复制,因而各农业网站之间互相复制彼此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往往缺少针对性,不能迎合农民的个性化需求;各种农业网站的农业信息服务质量差,实用性不强^[6]。

传统媒体以传播农业方针政策为主,显著特点是单向性强、反馈机制弱,使受众不能及时表达意见,也使得传播者无法随之调整自己的传播行为。新媒体有必要建立专业的农村信息采集队伍,增强涉农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让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迎合农民的个性化需求,并注重农民的信息反馈,真正发挥媒体的作用,而不只是“形式扶农”。

3.2 政府应加强扶持以保障发展

3.2.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通过媒体传达政策、引导舆论、稳定民情;而媒体需要政府的资源和政策扶持,来增强自身的传播力和话语权^[2]。想要进一步推动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单靠农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给予必须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支撑,从而为新媒体对农传播打下硬件基础。

网络通信技术是新媒体的根基,只有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率,提升农村地区的宽带网速,扩大4G移动互联网的辐射范围,才能保障农民顺利地运用新媒体去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水平与能力,真正地帮助农民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7]。农民首先要能接触到新媒体,接下来才能谈及运用新媒体,发挥新媒体的优势来培育新农民。

3.2.2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政府主导,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直接目的是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目前,我国农民教育与培训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全国而言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培训规模小,在此次针对江苏的调研中发现,几乎没有农民真正接受过非常系统地培训,在农业技术方面仍以传统技术为主;二是认识不到位,很多地方对农民培训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忽略对当地以务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农民的培训;三是投入不足^[8]。应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保障农民教育的供需平衡,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修养,同时增强农民对新媒体信息的辨别力。

3.3 新乡贤应发挥示范以推动发展 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

传播平台,农民的观点往往被排斥在精英化的大众传媒之外。即使在社会化媒体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面对丰富的网络资源与发布平台,农民依然选择“保留观点”“不管闲事”的处事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新乡贤,即官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大学生村官”等,应当转变思想观念,比道德声望,比法纪声望,比在道德与法治层面上能够带给乡村发展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深入农民群体,聆听农民“想言不敢言”的声音,为农民发声,带动农民发声。与此同时,考虑到农民群体的保守短视,想要新媒体对农传播顺利有效地开展,必须要培养“革新者”,尤其是农村一批受过较好教育、拥有获悉信息的手段和技能的年轻人,他们创新决策行为的实施和确认对后继者的观念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3]。

3.4 农民应开放心态以实现发展

3.4.1 主动谋求发展。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在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如今的我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我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他们以农民的省份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似农非农,似工非工”^[9],农村地区却也没用充足的人力去带动发展。农民应当为了建设更美家乡主动谋求发展,找到自身发展所需,找到家乡发展所需,使自己更贴合新型农民的标准,建设所在农村,描绘美丽乡村图景。

3.4.2 自觉参与发展。俗语言:“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新媒体在农村的发展必须要广大农民自觉参

与,不能仅靠硬性政策推行,政府、社会和外界人士等主要是提供外部条件的支持,农民要自发地接触新媒体,科学地使用新媒体,结合自身实际,对比与新型农民的差距,量体裁衣,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正确思想和各种教育培训,从中汲取最适合自身发展的内容。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其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10]。江苏自古以来为我国较富庶的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著名的“鱼米之乡”,拥有开放心态的农民可以更好地运用身边资源实现发展,以期江苏的新型农民培养经验能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李雪,贾卓炎. 传统媒体如何结合新媒体服务新农民[J]. 科技传播, 2016(19):63-64,170.
- [2] 曾繁旭,黄广生,李艳红. 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J]. 东南学术,2012(2):80-85.
- [3] 邹华华,刘洪. 新媒体对农传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新闻界,2007(2):70-71.
- [4] 梁媛,王娜. 主流媒体“三农”报道话题式传播的理念创新[J]. 编辑之友,2016(6):43-47.
- [5] 郑小强. 新媒体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与协同[J]. 甘肃农业,2013(18):34-36.
- [6] 吴霜. 新媒体语境下对农传播的策略研究[J]. 东南传播,2015(2):105-107.
- [7] 路璐,姚成静,曹磊. 人的现代化:新媒体对新型农民的培育研究[J]. 中国农业教育,2016(2):37-42,73.
- [8] 柯炳生,陈华宁. 对培养新型农民的思考[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4):36-38.
- [9] 胡俊生. 农村教育城镇化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1.
- [10] 晏阳初.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02-515.

(上接第225页)

系,推动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提升服务能力,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加快城乡体制机制改革步伐,着力形成城乡对接、信息共享、两端发力、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格局。

3.3 尽快修改完善乡村规划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一是尽快出台《山东省乡村规划技术标准》,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或技术指南、手册。二是研究出台乡村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特别要加强乡村建筑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管,严格控制乡村建设用地扩张,改变乡村建设的无序状态。

3.4 加强乡村规划研究,积极探索新常态下的改革方向与路径 ①乡村规划与城市规划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乡村多样复杂带来的发展路径不确定性,难以用“宏大理论”来概括乡村发展的规律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规划的首要原则是体现差异化发展特点^[13],各美其美,避免“一刀切”、运动式的“规划覆盖”,要以提升乡村发展的组织能力为根本目标。②乡村规划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设定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应特别需要在坚持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探索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方向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避免陷入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或消极的“时间解决问题”等怪圈。③乡村规划建设要将保护生态环境、均等化布设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等值化的现代生活

作为重点与难点,针对农村居民点分散的特点,探索与其相适应的低成本、生态化、小型化的设施配建模式。④探索改革乡村规划建设与管理体制、涉农资金整合与强化部门协同等的具体方式、流程与机制,形成促进乡村发展的合力。

参考文献

- [1] 杨德智,张卫国. 山东省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探索与实践[J]. 城市规划, 2010,34(4):69-73.
- [2] 李兵弟. 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实践探索[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87-194,224-229.
- [3] 胡滨,薛晖,曾九利,等. 成都城乡统筹规划编制的理念、实践及经验启示[J]. 规划师,2009,25(8):26-30.
- [4] 曹玮,曹荣林. 关于当前农村建设与规划的几点意见[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2):10845,10847.
- [5] 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45-50.
- [6] 张尚武. 乡村规划:特点与难点[J]. 城市规划,2014,38(2):17-21.
- [7]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 [8] 张京祥,陈浩. 中国的“压缩”城市化环境与规划应对[J]. 城市规划学刊,2010(6):10-21.
- [9] 赵晖. 大力推进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施[J]. 小城镇建设,2014(11):14-15.
- [10] 李东升,朱教国,胡云飞. 对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机制的思考[J]. 农村财政与财务,2011(6):22-23.
- [11] 李昌平. 乡村规划设计应该走出“城市化”歧途[J]. 小城镇建设,2015(1):46-47.
- [12] 罗小龙,许晓. “十三五”时期乡村转型发展及规划应对[J]. 城市规划,2015,39(3):15-23.
- [13] 张尚武,李京生. 保护乡村地区活力是新型城镇化的战略任务[J]. 城市规划,2014,38(11):28-29.